

1922年5月5日至10日,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,标志着共青团正式成立。然而,鲜为人知的是:共青团的历史发端于上海,团的“一大”起先曾安排在申城举行;建团初期,一些革命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。



俞秀松



施存统



恽代英



任弼时



陆定一

俞秀松 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

1920年6月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,随即积极开展工作。

那时,上海已经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,各地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都来到这里,希望吸收新知识、接触新思想。李达的《一九二〇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》说:“五四”运动后,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四川等地,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,要求思想解放。这些青年,都有一股朝气,想干革命工作,想谋出路。”“到上海找‘新青年社’”。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筹建团组织。俞秀松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的成员,义不容辞。8月22日,俞秀松与施存统、沈玄庐、陈望道、李汉俊、叶天底、袁振英、金家凤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,并担任书记,机关设于霞飞路渔阳里(今淮海中路567弄)6号,这是一幢石库门房屋。

为了掩护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、便于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办起了外国语学社。9月28日,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头版登载《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》:“现已成立英俄日日语三班,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,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,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。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。日内即行开课。名额无多,有志学习外国语者,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。”俞秀松首先在外国语学社发展团员三十余名;后来,团员逐渐增加到约二百人。在团内,俞秀松每周安排一次政治报告会,他常自己登上讲台,同时请陈独秀、李达等作演讲,所以包惠僧的《党的“一大”前后》说:“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,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。”俞秀松不断激励团员的政治热情,不少人深入工厂调查,踊跃参与筹建机器工会、开办工人半日学校、纪念“五一”宣传;他们也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工人刊物《劳动界》撰稿,发表了《我们的劳动力哪里去了?》《黄包车夫拉车吐血》《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》等。

在党组织领导下,俞秀松废寝忘食地处理多种事务,使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起色。它虽具有地方性,但实际起到全国青年团发起组的作用,广州、北京、天津、武汉、长沙、唐山、太原、济南等地很快都出现团组织。

1921年3月,全国已经有团员千余人,于是在沪建团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,由俞秀松担任书记,机关仍设于渔阳里6号。此时,青年共产国际(也称少共国际)东方书记部致函上海青年团,邀请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,信中赞扬“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”。俞秀松在家书中说:“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,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(大会)的代表”;他出席大会时,在报告中对我国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、上海建团等论述甚详,并指出:“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,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。”翌年春,他回国赴杭州建团。



当年的《列宁青年》



《先驱》刊头



早期的《中国青年》

石库门里掀开团史第一页

朱少伟

恽代英 主编《中国青年》

1923年8月,团的“二大”在南京召开。为更好地“以共产主义原则”去“教育工人、农民、学生群众”,团中央决定筹办新的机关刊物《中国青年》,《先驱》出至第二十五期停刊。10月20日,《中国青年》在上海问世,系三十二开本,每周出版一期。首任主编为团中央分管编辑工作的委员恽代英,萧楚女、邓中夏、张太雷、林育南、李求实等相继担任主编或指导编辑工作。该刊初期以辣斐德路186号(今复兴中路196号)为通讯处,至1924年春租用淡水路朱衣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屋(今位于延中绿地)作编辑部。

《中国青年》的发刊词阐明,其宗旨是要成为青年“忠实的友谊的刊物”。在第四期发表的《我们的希望》中指出:“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。我们要为这些青年打

任弼时 给青年工人讲课

1924年初秋,任弼时到党领导的上海大学执教,并参与编辑《中国青年》。此时,任弼时住入孟纳拉路(今延安东路)富康里482号,系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屋,二楼亭子间为他的居室,里面仅放单人床、书桌、书架和煤油炉;稍宽敞的前楼,后来成为团中央机关。任弼时在这里常熬夜备课,并写下《列宁主义的要义》《马克思主义概略》等文章。1925年1月,团的“三大”在上海召开,决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任弼时当选团中央委员,兼任组织部主任,接着又任总书记。他为了密

施存统 “团一大”当选团中央书记

1921年5月,由于俞秀松和一批骨干相继赴苏俄学习等原因,团组织的活动无形停顿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,对此非常重视,张太雷在恢复团组织时,主持制订了临时章程,其中规定:“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,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。”

1922年初,施存统从海外回国,在沪负责团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地方团组织日常工作,旋又主办《先驱》(这份半月刊原由北京团组织出版,因遭查禁移至上海)。此时,团的临时中央局机关搬到大沽路356—357号(门牌后来改为400—402号,现已拆除),系两幢石库门房屋。上海地方团组织机关也设于大沽路357号,施存统常在这里布置团的工作;团员大会也在此举行,多时近百人,连天井都被站满。

随着各地团组织的纷纷建立,全国的团员迅速增至数千人。在此情况下,团的临时中央局认为有了新的发展契机,所以积极筹备,并通知各地团组织:将于4月在上海召开“团一大”。3月6日,中共广东支部负责人谭平山写信给施存统提出建议:“大会地点,如能改在广州更好,因为比较自由。”中共中央和团的临时中央局鉴于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,广州已经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兴盛的地区,遂采纳这个意见。

团的“一大”召开时,施存统当选团中央书记。《新青年》杂志第九卷第六号在通讯中谈到:“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,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。”5月15日,已经成为团中央机关刊物的《先驱》出版专号(第八期),集中登载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》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》《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》《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》《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》等文件。

《先驱》在上海印行期间,由施存统担任主编,蔡和森、高尚德等参与编辑,编辑部曾设于团的临时中央局机关。该刊系四开四版报纸型,逢需增刊则加半张至两张;主要栏目有“评论”“政治短评”“研究”“言论”“译述”“通讯”“随感录”等。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,强调“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指导理论”,对各种机会主义思想进行坚决批判,还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青年运动情况,登载团中央文件和各地团组织活动消息。陈独秀、蔡和森、李达等常为《先驱》撰文。施存统的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》说:“《先驱》刊物的出版工作,从约稿、写稿、编辑,到校对、跑印刷厂,都是我一个人干。”

6月9日,上海租界当局查封团组织机关。尽管如此,团组织仍在险恶环境中继续发展。

除一切陈腐邪恶的空气,指点他们最经济最有效力的途径。”该刊主要栏目有“通论”“时事述评”“青年团体消息”“青年问题”“民间的调查”“革命运动史”“青年与文艺”“新刊批评”等。该刊根据青年的特点,从青年的生活、思想实际出发,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平易流畅的文字,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,有力抨击错误思潮,深入评析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。毛泽东的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《青年运动的方向》等也曾在此登载。

恽代英在负责《中国青年》期间,没有让这份刊物的读者面局限于先进青年,而是着重于广泛联系群众,他在第七十期发表的《我们请读者诸君帮助》中提出:“我们要把《中国青年》变成全国青年界的机关报纸,所以我们要欢迎各地青年团体借《中国青年》做他的通信机关;一切与青年有关系的进步的团体亦可以在《中国青年》中间报告他的消息,以及表示他们对于青年的希望。”由于旗帜鲜明、贴近青年、内容精彩,受到普遍的欢迎,该刊发行量逐渐达三万册。

切同青年工人联系,定期去曹家渡纯善里的平民学校讲《共产主义ABC》;另外,还前往沪西工友俱乐部作调查,并提出:“可以分日夜两班上课,白班的工人晚上活动,夜班的工人白天活动。要迅速把团支部建立起来,一个厂里有三个团员就可以成立团支部或小组。”

五卅运动风起云涌时,任弼时多次在富康里482号团中央机关召开紧急会议,发动各界青年踊跃投入斗争。6月2日,他在签署的团中央通告里发出“此次反帝运动应尽量扩大到全国”的号召。不久随团中央机关搬到北四川路(今四川北路)大德坊。至1926年春,他的未婚妻陈琼英由湘来沪,两人在简陋的亭子间里结婚。陈琼英常把丈夫起草的文件送给中共中央领导人,或带出去秘密排印。

早期在沪 团中央机 关旧址



陆定一

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

1926年秋,陆定一被调到上海团中央机关,负责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联系,并协助宣传部做文书工作;接着又参与编辑《中国青年》。由于他的英文学得较好,所以除了自己撰稿,还从上海《密勒氏评论报》《大美晚报》和《大陆报》等外文报纸译写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文章。《郑超麟回忆录》提及,他当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时,“C·Y·(即‘共青团’英文简称)中央宣传部陆定一,和我天天见面,我们一同采访新闻,一同编辑宣传刊物,一同起草宣传大纲和拟定标语。”
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中共中央机关移至武汉。陆定一奉命随行,不久担任共青团团中央宣传部部长。翌年春,他回到申城,此时《中国青年》已经更名《无产青年》。隔了近半年,他根据有些同志的建议,也鉴于环境险恶,把它改为《列宁青年》,继续在沪秘密印行,其“发刊辞”申明“本刊继续《中国青年》而出版”。他曾兼任《列宁青年》主编,并署名“定一”在第一至五期发表了《广州暴动后的阶级形势》《资本主义的末日》《拼命卖国的国民党外交》《唐唐同志的死》和《中国革命的前途》。

1928年冬,按照党组织的决定,陆定一去莫斯科开展工作。1930年6月,他重返申城,仍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。那时,他寓居同孚路(今石门一路)一幢石库门房屋前楼,平日出去办事很谨慎,如有次到沪东开会发现有可疑男子盯梢,就先乘上黄包车,再找机会跳上刚要关门的电车,随后脱掉长衫悄然走出车厢,机智地甩掉了“尾巴”。

1933年1月,团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,陆定一也同时离开申城。



任弼时留下足迹的沪西工友俱乐部旧址